

沈宗瀚自傳及年譜評介

張朋園

沈宗瀚著：克難苦學記，民國四十三年，台北，正中書局。

沈宗瀚著：中年自述，民國四十六年，台北，正中書局。

沈宗瀚著：晚年自述，民國六十四年，台北，正中書局。

（合訂本，沈宗瀚自述，民國六十八年，台北，傳記文學社）

黃俊傑編著：沈宗瀚先生年譜，民國七十年，台北，東昇出版公司。

一、引言

沈宗瀚（一八九五—一九八〇）是一位傑出的農業專家，他參與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先後達半個世紀之久。沈氏同時是一位很有歷史責任感的人，他自己寫了三本回憶錄，另外還有許多著作留了下來。從他的文字中可以了解近五十年來中國農業發展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黃俊傑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他的主要研究是中國思想史，同時對中國的農業發展史也很有興趣。他早已注意到了沈宗瀚的重要性，特別為沈氏編著了一本年譜。

本文將沈氏的三本回憶錄和黃教授所編的年譜合併一起在此介紹。

首先略為介紹沈宗瀚的生平。沈氏生在浙江餘姚的一個村莊上。餘姚盛產棉花，沈氏從小就立志要改良棉花的種植，所以他選擇省立的農業職業學校和北京的農業專門學校攻讀。畢業後做了幾年的事，於二十九歲（一九二一）赴美繼續攻讀農學，先後獲得喬治亞農科大學（Georgia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碩士、康南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

sity) 農學博士。由此可知，他接受了完整的農學教育。

學成之後，立即回國，入南京金陵大學執教。一面教書，一面研究，育成二九〇五號小麥，產量高出一般小麥32%。沈氏又從事稻米、高粱、木棉等的雜交研究，極有心得。不幸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失去安定環境，沈氏的研究工作亦因之中斷。抗戰期間，他擔任中央農業實驗所（簡稱中農所）的副所長，兼任行政院農業促進委員會委員，經濟會議糧食組副主任，策劃戰時糧食生產，對貴州、廣西、四川、雲南等省的農業生產提出積極性的規劃。

抗戰勝利後升任中農所所長，民國三十七年中美合作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成立（簡稱農復會），沈氏為五位委員之一，推動農業改革，曾至全國十五省考察。為實行二五減租，數度前往福建、四川、湖南、廣西等省實地規劃，然不及見到預期成果，大陸即陷共產黨之手。

三十八年十月來台灣，農復會重點亦轉到台灣，自此他的全部精力用在台灣的農業發展上。台灣近三十年的農業建設與沈氏有密切的關係。

二、克難苦學記

沈氏的三本回憶錄，題為「克難苦學記」、「中年自述」、「晚年自述」。這三本書代表三個不同的時代。很明顯的，克難苦學記是記述他求學時代的生活。他出生在一個中落的傳統紳士家庭中，他的父親沒有足夠的財力供給他讀書求學。從讀省立農校開始便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三歲獲得農學博士為止，幾乎都在負債的狀態中。但這本書不僅反映一個青年苦學的經過，同時還有許多農村社會的寶貴史料。舉例言之，本書可以使我們了解浙江的農村生活。江浙是中國較為富庶的地區。沈氏說他的家鄉並無大貧大富；最富的人家也不過有田三百多畝，最貧的也有七、八畝。農村每日三餐飯，全村沒有乞丐，百年裏沒有人打官司。（頁一）這一類的記述，使我們對浙江地區的富庶得到了印證。

中國的農村有地主和佃農。地主人家不一定富有，而是因為他們大多屬於紳士階層，紳士階層是很少自己耕作的。他們的職業是教書。沈家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沈氏說，他的父親自己出門到人家去教書，每年可得束脩制錢四千文。他們家的祖田十二畝便雇一個長工和牧童來耕種，每年可以收租金一百五十銀元。（頁七）

紳士階級的人家並不一定富有，沈家就是明證。他們家是一個七口之家。要應付七個人的飯食、衣服、鞋襪，他們的三餐有一餐必須吃泡飯，晚上只能點菜油燈，而且只能用一根燈芯。那時的洋火已很普遍，但沈家不用洋火，取火是用火石。（頁七）

清末民初是中國新舊教育轉變的時代，沈氏所受的教育反映了轉變的某些方面。他是學農的，他在杭州笕橋農校讀書時，教師們所用的教材大多取自日文教科書。他說：

「教師多述日文筆記充教材，不切合實際情況。昆蟲學常以日本『千蟲圖解』充當標本，從未領導學生至野外採集。余偶採蟲問之，彼即以之與『千蟲圖解』對照，加以臆測，亦從未教余等飼蟲研究。園藝教員授蔬菜，則亦多選擇日文講義數冊，而未嘗實地認識蔬菜，亦不調查栽培苗種等方法。作物教員因在日本學畜牧，乃譯述『牧草』講義，而於笕橋最著名之藥用作物從未提及，教室與環境完全隔絕。田間實習僅種蘿蔔白菜，或作整地、除草、施肥等工作……實習教員遠不及『我家』三哥也。」（頁二九—三〇）

這一段話足見早期的職業教育程度甚低。

此外，本書尚有許多極具史料價值的記載。例如民國九年四月沈氏赴湖南常德擔任植棉場場務，那時常德是北軍馮玉祥的防區。他到達之後，馮氏不以其初出茅廬，有心向他學習植棉知識，沈因此一度做了馮玉祥的老師。沈的記載說：

「（九年）五月下旬，馮玉祥旅長約余每週在彼旅部講述植棉學二次，彼與鹿鍾麟團長、劉郁芬參謀長、宋哲元副官及聞承烈、劉汝明營長等均來聽講。馮旅長筆記甚勤。我的餘姚官話，彼能耐心細聽，筆記清楚，殊非易事。」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馮旅長特來德山參觀棉場，行前未嘗通知，至廟不見我在，詢悉余日常在田間工作，轉到棉田見余草笠赤腳除草，余向彼說明棉花生長狀況後，引彼至余住室，見中英日文書籍滿架，極表欽佩。……此後彼禮遇有加，演講之日，邀余共餐，飯菜多為清菜豆腐，炒鷄子，燉肉，或燉雞等四五菜，極合衛生。」

「六月間，皖直戰爭，馮旅在常（德）四面楚歌，而無後援。七月初，余在旅部，馮云：『今夜須聽前綫電話，恐不能睡矣！』次早六時半，約余同進早餐。入室彼正忙看地圖，告余曰：『昨夜前綫已開火矣！』飯後七時，為講棉時間，余詢須暫停否，彼謂尚有時間可以上班。隨即領班聽講。講後，余視其筆記，清楚如前。斯時時局不靖……七月六日夜

八時餘，余隔江看馮軍夜行，靜肅異常。次早知馮軍於一夜間已完全退出常德境。是夜七時，他軍漸從山後而來，衣服破爛，軍紀敗壞。」（頁六九—七一）

克難苦學記是四十三歲（民國二十六年）寫成的，六十歲（民國四十三年）出版，今已銷行十五版之多。

三、中年自述

中年自述是沈宗瀚三十三歲至五十一歲（民國十六年至三十四年）的自傳，前後包括十八年的生活。胡適爲這本自傳寫序說：「一切自傳，最特殊的部份必定是幼年與少年時代，寫到入世做事成名的時期，就不能不有所顧忌，不能不含蓄委婉了。」讀盡全書，確實與胡適有同感。雖然這本傳記含蓄而又委婉，仍然反映了中國農業現代化的許多重要問題。

中年自述包括國民政府兩個重要的時期：前期——十六年至二十六年——是民國最安定的時期，民國稍有建設，大多成於斯時；後期——民國廿六年到卅四年——是中華民族艱苦對日抗戰的八年，中國人慘澹經營的些許建設，都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摧毀無遺，中國的現代化爲之停滯，甚而倒退。沈氏的平實記載充分反映了這一個事實。由於他是一個農學家，他的記載以農業方面爲主。

中國人總是說中國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這一句話直至三十年代而不改口，不知發生了多大的負作用。因爲領導階層口口聲聲的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便不去思索中國的工業化問題。即使強調以農立國，也很少有人去發現或研究農業問題。我國的農業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依然是傳統的，這在沈宗瀚的書中充分的反映出來。他說：「因爲中國政府不重視農業，以致各省農業改進頗爲困難。」（頁一八六）他說政府不重視農業是有根據的，國民政府的農林部，形同聾子的耳朵，只是一個擺設而已。何以知之，農林部長都是外行人。第一位陳濟棠，軍人，第二位沈鴻烈，軍人，第三位盛世才，依然是軍人。沈氏提到他們時，並沒有表示不滿，只是分別在他們名字下的括弧內寫着「陸軍上將」、「海軍上將」的頭銜，（頁一二四—一三〇）這無異於一個抗議。

中年自述提示了我們研究農業史的一些方向。金陵大學與中國近代的農業發展是其一。我在讀中年自述之前，對於金大農科的情形知之甚少。金大是一所教會學校，創立於一八八八年，原先只是一所文科學校。「民國三年，美籍數學教授裴義

禮 (Joseph Bailie) 住於〔南京〕鼓樓宿舍，夜聽江北難民啼哭，激動了慈悲心，遂設法取得華洋義賑會捐款，雇用難民，在紫金山造林，以工代賑。繼感農林人才缺乏，乃創設農林科。」(頁一)自此以後，不斷有美國農業專家來金陵執教。沈氏提到的有芮思婁 (J.H. Reiser) 康南爾大學畢業即來金大)、裴來 (L.H. Bailey, 康南爾大學農學院院長)、史文格 (W.T. Swingle, 美國農部植物學家)、吳士偉 (C.W. Woodworth, 蠶桑學家)、郭任風 (J.B. Griffen, 棉植專家)、羅德民 (Walter Lowdermilk, 土壤專家)、洛夫 (H.H. Love, 小麥專家)、馬耶 (C.H. Myers, 小麥專家)、卜凱 (J.L. Buck, 農業社會學家) 等。中國早期的農學家也大多執教金大，例如凌道揚、鄒樹文、鄒秉文、錢天鶴、謝家聲等。都是留美回來的農學專家。這些中美學者，對中國的農業發展有一定的貢獻。例如吳士偉與錢天鶴的無毒蠶種、郭任風的改良中美棉品種、芮思婁的二十六號改良小麥品種、羅德民對華北黃土區域與水土保持關係的研究、卜凱對「中國土地利用」的研究，大多遠近知名。沈宗翰也是金大的教授，他的二九〇五號小麥改良品種尤有成就。如果我們選定金大的農科作為研究對象，必定可以寫出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

中央農業實驗所是國民政府設立的一所農業技術研究機構。中農所創立於民國二十年，所址在南京，發展迅速。不幸抗戰爆發，南京不守，該所的設備均毀於戰火。沈氏於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撤退時，四處巡視，依依不捨。中年自述說：「回憶二十二年徵購所得的半熟荒地二千五百七十畝，現已開溝築路，闢成了大片的稻麥桑等試驗地，建造了五座實驗大樓，一座行政大樓，十餘座職員宿舍，有大溫室、大冷藏室、高溫室、細胞研究室等貴重設備，路邊種樹栽花，極盡鄉村幽美。全所職員一百餘人，為國內農業人才設備最完全的機構，並樹立了農業研究的模範與公正無私的風氣。」(頁六二)中農所在學術上的成就以及該所對中國農業發展的規劃，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和評估。

抗戰時期日本轟炸西南大後方的慘無人道，沈氏摘錄他的日記納入回憶錄，讀之令人心酸：「二十八年一月二日，敵機近常來襲，惟因〔重慶〕霧大，輒在附近各縣投彈，炸死鄉人甚多。」(頁九九)「二十七年二月四日，貴陽被敵機轟炸甚烈……炸傷炸死的很慘。」(頁一〇一)「五月四日，五時餘〔重慶〕敵機投彈頗多，本所廁所落一小彈，幸未起火。本所周圍落了五、六個大炸彈，起火，防空壕震動極為劇烈……後因火勢逼近，憲兵催走……九時許火勢稍衰……十時許火勢復盛……見炸死燒死的人很多，慘極……見街上很多滑竿擔了燒焦的屍身，快步出城，慘不忍睹。」(頁一〇三—一〇四)「

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起，五天五夜均有警報，每次約四至六小時，稱為疲勞轟炸，身體極為疲憊。」（頁一二二）「二十七年八月，一、二、三夜敵機接連夜襲，每夜入防空洞三四小時。」（頁一〇七）

抗戰時期生活的艱苦，沈氏有淋漓的敘述。例如他談自己的生活，「自民國四年北京讀書起，早餐吃二個雞蛋，到了三十一年減吃一個；三十三年後，一個雞蛋亦不吃了。肉更少吃了。我家夜間點燈，抗戰初期用洋油，二十九年起用菜油，三十三年起改用桐油，因那時桐油不能外銷，價較菜油為低。但桐油燈光不足，看書寫字很費眼力。四川人燒菜用豬油，以菜油點燈。公教人員吃不起豬油，祇能吃菜油，而點桐油。」（中農所）同人生活大多與我相同，比我苦者尚多。……此時為提高同人工作情緒，不能不力謀他們的福利，但常因經費短絀，以致心有餘而辦法不多。幸有幹練的同事組織福利委員會，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多做化錢少的小事，如利用農場隙地種菜養豬，磨豆腐、發豆芽等，按每家人口多少，不分職位，一律廉價配售，同人均尚滿意。」（頁一九四）

四、晚年自述

「晚年自述」是沈氏五十一歲至八十歲的自傳，先後三十年（民國卅四年至六十四年）。這三十年當中，沈氏的生活和事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段自抗日勝利到國民政府撤離大陸（卅四年至卅八年），後段自退居台灣至八十歲退休（卅八年至六十四年）。自抗戰末期沈氏以副所長身份負責中農所責任至卅六年正式升任所長，接着籌劃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參與高層決策，他的責任加重了，影響面擴大了。他的經歷主要關係着全國性的農業發展問題。

晚年自述大半以農復會的工作為主要內容。有關農復會的記載，可以分為緣起，在大陸的工作，在台灣的工作等幾方面。我們知道農復會是一個中美合作的機構，其由來與中美農業合作團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中美農業合作團是沈氏與美國大使館參贊陶遜（Owen L. Dawson）發起的，擬以美國技術與資金的協助，加速中國農業的重建。此一構想得到美國農部與中國政府及農業界的贊同，於民國三十五年組成。中國方面的代表有鄭秉文、沈宗瀚、馬保之、楊懋春等十三人，美國方面有赫濟生（C. B. Hutchison）、穆懿爾（R. T. Moyer）、卜凱等十一人。這一個中美團體，為了解中國戰後的農業實際情形，曾經考察江蘇、浙江、河北、遼寧、吉林、綏遠、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川、廣東、廣西、雲南、台灣等

十五省。考察之後，提出改進中國農業的報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因此向美國建議，繼續中美農業合作。到了三十七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倡導人晏陽初氏向美國國會說明中國農業復興的重要性。後來因為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的建議，晏陽初提出一備忘錄，建議成立一聯合委員會，農復會因此於卅七年十一月成立。

農復會最早的五位委員，美方為穆懿爾、貝克（J. E. Baker）二人，中國方面為蔣夢麟、晏陽初、沈宗翰三人。早先農復會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是辦理成人識字教育，組織農民生產合作機構，其次是解決基本農業問題，如改革租佃制度，興建水利系統，供應改良作物品種，防除病蟲害。從三十八年夏天起，發動五項致力於促進人民福利與增進生產的短期工作。在四川、廣西、貴州協助政府推行二五減租，改革各省農會，擴充灌溉設施，推廣改良品種，防治傳染病。不幸這些工作只做了數月，湖南、廣東、四川、廣西等省先後淪入共黨之手，農復會不得不撤退。沈氏的回憶錄中，對農復會在大陸數月的工作，有一個總述：

「民國卅七年十月至卅八年八月止，農復會在大陸實施了九十一個農業改良計劃，十六個農民組織計劃，十八個農村工作計劃，七個公民教育計劃，五十一個灌溉計劃，廿五個農村衛生計劃及八個土地改革計劃。」（頁三十一）在這一段期間，中農所與農復會合作，沈氏數度飛往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督促業務，工作十分忙碌。沈氏的記載顯示農復會在大陸的工作，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農復會遷來台灣，因受當時政局的影響，幾度瀕於解散。沈氏說：

「三十九年二月十日，下午五時在主任委員家中開會，出席者為主任委員蔣夢麟、委員穆懿爾、貝克與我及各單位主任錢天鶴、湯惠蓀、許世鉅、蔡一諤、蔣彥士、樊際昌等。蔣主任委員首先說明台灣局勢緊張，繼即商討兩大問題：（一）萬一局勢危急時，同人如何從台灣撤退；（二）儘量裁減職員以減少撤退時之困難。……穆懿爾聲明美國大使館僅能負責美國職員之撤退，而不負責中國職員之撤退，亦提出裁員及改組計劃。……同人聞之，益為不安。」（頁四三）

「二月十六日起，本會改組……改組畢，蔣主任委員去美，穆懿爾代理主任委員。我與穆懿爾每天晤談一次，處理會務，交換情報，天天有關閉的危險。我謂農復會創辦不易，決不輕易關閉，穆懿爾深以為然。」（頁四三—四四）

「民國三十九年五月至六月上旬，美國大使館因為局勢緊張，撤退美國在台灣之婦孺。穆懿爾夫人遂離台回美，穆懿爾

獨自留台，更形緊張孤寂。」（頁四四）

這幾段記載反映農復會的危機，也顯示台灣政局的汲汲可危。幸而三十九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政策改變，美國再度決定援助台灣，大局轉趨穩定。

台灣農業能有快速的發展，從「自述」中可以體會到有種種改革和創新。第一是土地改革。台灣於實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之後，農村經濟迅速繁榮，這是因為打破了傳統租佃制度的關係。沈氏說：「如無土地改革而專事農業增產，則增產的利益多為地主取去，農民對於增產無大興趣。」（頁三四）充分說明了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國民政府在大陸上的失敗，土地政策的不夠積極，大有關係。

第二是實行五次四年計劃。第一次從四十二年至四十六年，第二次自四十六年至五十年，第三次自五十年至五十四年，第四次自五十四年至五十八年，第五次自五十八年至六十二年。每一次四年計劃都有特別的重點。例如五十二年重訂的目標為：1.增加生產，每年4.5%；2.增加外銷，每年6.5—7.5%；3.增加工業用的農業原料之生產。要達到上述目標，必須：①減少災害，故水土資源的保護很重要；②加強農業教育、研究，推廣農貸、衛生等。（頁五五—五六）民國五十八年以後，由於農業的處境不利，不得不擬定新的政策：①加強機械化；②設置平準基金，穩定農產價格；③加強農民組織與服務；④發展農產品加工及拓展外銷；⑤改訂農貸政策；⑥加強各種農作之生產；⑦進一步開發山坡地。（頁六十）民國六十一年，中央撥二十億元新台幣發展農業，再度改訂政策：①廢除肥料換谷制度；②取消田賦附征教育費；③放寬農貸條件；④改革農產運銷制度；⑤加強農村公共設施；⑥加速推廣綜合技術栽培；⑦倡設專業區；⑧鼓勵農村設工廠；⑨加強試驗研究推廣。（頁六一—六二）台灣的農業就是在不斷的發現問題，改訂政策，適應需要的情況下，穩定而迅速的向前發展。

台灣的農業發展，美國的幫助大有關係。後來台灣的農業有了成就，轉而幫助別的國家。沈氏的晚年自述對於農業技術援外，述之甚詳。民國四十八年開始援助越南，五十年派農耕隊赴賴比瑞亞，自此農耕隊不斷出國，開辦非洲農業技術人員訓練班，先後十八個亞非及中南美國家接受中華民國的援助。民國五十七年第九屆非洲農技人員訓練班開學，三十個國家，四〇七人來台受訓，台灣的農業技術是一流的。（頁八四—八八）

以上所述，可以了解沈氏的三本自傳反映近代中國農業發展的一些重要事跡。沈剛伯說：「這三部自述，簡直可以當作

我國近八十年來現代化的簡史讀。」（傅安明「永懷沈先生」，沈宗瀚先生紀念集，頁二〇五）。這雖是推崇之詞，與事實相去並不太遠。

五、沈宗瀚年譜

史學界對沈氏衷心推崇並深入研究其一生事功的，是黃俊傑教授，他為沈氏編定一部二十萬字的年譜，同時又有一篇探討沈宗瀚思想的論文。黃教授說他在讀大學的時候就讀過沈氏的「克難苦學記」，這本書對他有非常大的「內心震撼」。今天他在大學歷史系擔任中國現代史的課程，便以克難苦學記作為教本。（「懷念沈宗瀚先生」，紀念集，頁二一五—二一九）黃教授為了研究民國以來的農業發展史，搜閱沈氏的著作，每得一篇，則將之影印，最後「裝訂成冊」，自謂得到沈著的啓示甚多。

「沈宗瀚年譜」的撰成，是因為黃教授要「有系統地掌握資料，就按年按月按日把與沈先生個人有關的史料作了整理，」寫成年譜。（同上）年譜撰成時黃教授尚未見過沈氏，但後來他們成了朋友，於沈氏多所請益。這部年譜於兩年前發表，相當完整。

沈譜是研究沈宗瀚的基本「工具」書。何以言其為工具書？第一，可以藉本譜而了解沈氏個人人事跡發生的先後關係，參照沈氏的綜合性自傳，能夠深入觀察每一事件的原委與時間關係；第二，沈氏一生的著作極為豐富，每一篇文章撰成的年代與當時的社會環境關係，可以一目了然。有此兩大效用，本譜的宗旨就達到了。

沈宗瀚年譜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稱克難苦學時期（一八九五—一九二六），中篇稱建設大陸農業時期（一九二七—一九四九），下篇稱發展台灣農業時期（一九四九—一九八〇），時間上大體與沈氏的三本自傳相契合，惟中篇下篇以一九四九年為分水嶺，稍有不同，益能見出時與勢的關係，是十分得宜的。

年譜中引述了一些今日不易得見的早期資料，還有當時人的著作，參考可稱完備。最可貴的是附錄二十一「篇沈氏的著作，其中十七篇為一九四九年以前所著，四篇為在台灣所著；前者討論的大多為大陸的農業發展問題。例如「改進西北農業應取之程序」，「全國各地小麥麵粉數量及價格」、「改進貴州農業計劃」、「食糧生產之增進」、「推進抗戰後方的小麥雜

糧生產案」、「抗戰期中的糧食生產問題」、「小麥工作報告」、「中國糧食問題」、「中國戰後麵粉業之設計」，都是了解大陸農業的重要史料。還有幾種英文文件，是中美農業合作的關係史料，為研究中美合作史之不可少者。黃教授的選擇是很有眼光的。

黃教授又細心重訂沈氏的著作繫年。沈氏的晚年自述原附有其著作目錄，但截止於民國六十四年。黃教授將六十五年以後的三十八篇論文納入重編，可說是最完整的沈氏著作目錄。

沈宗瀚的著作，除了三本自傳外，另有專著三種，均分別以中英文出版，茲將書名開列如下：

1. 中國農業資源（台北，中華書局，民國四十一年）

Agricultural Resources of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1)

2. 台灣農業發展（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三年）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n Taiwan Since World War II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二十年中美合作發展農業之經過（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九年）

The 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Twenty Years of Co-operatio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這三本書，中國農業資源是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陸農業的主要參考書，今已成爲經典之作。台灣農業之發展，討論民國三十六年以來台灣的農業生產技術，土地改革，農會組織，家庭計劃等問題，是了解台灣農業的必要參考書。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一書，敘述中美農業合作的經過，為研究中美關係史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沈氏的散篇論文，中文的共計二五二篇，英文的九十六篇。將之略爲歸納，可得下列各類：

(一) 糧食與種子改進，六三篇（一般性討論二三篇、小麥二一篇、棉花五篇、高粱二篇、稻米十篇，其他二篇）。

(二) 農業技術改進，八六篇（一般性討論五七篇、農業計劃十三篇、機械化六篇、肥料二篇、水利一篇、畜牧一篇、防災一篇、農業科學化五篇）。

(三) 農村與農民生活，十九篇（農村經濟七篇、農稅四篇、農村與都市一篇、農業與人口二篇、農民生活五篇）。

(四) 地區農業發展，六篇（四川二篇、貴州一篇、西南二篇、西北一篇）。

(五) 台灣農業機構及其工作，三十八篇（農復會二四篇、農會八篇、蔬菜中心六篇）。

(六) 中外農業合作，十四篇（中美三篇、東南亞六篇、其他國家五篇）。

(七) 戰時糧食，三篇。

(八) 土地改革，十三篇。

(九) 農業與工業關係，七篇。

(十) 農業教學與研究，九篇。

(十一) 外國農業，二篇。

(十二) 中共農業，四篇。

(十三) 人物回憶，四五篇。

(十四) 其他（包括演講、報告、書評等），四三篇。

從這張書目看來，可以知道沈氏的農業知識是多方面的，他的眼光也是多方面的。

六、結語

以上的討論，偏重於沈宗翰回憶錄的歷史資料性質，用意是強調沈氏個人資料用於研究近代中國農業史的重要性。當然沈氏在中國近代農業史上必有其一定的地位，如果要研究沈氏的事功，自以先讀黃俊傑教授所編年譜為宜，三本自傳更是基本的素材。